

## 元代会同馆论考

王 静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元代设有会同馆作为专门接待入京朝贡的周边四夷使节的客馆,它的设立对发展元与周边四夷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会同馆也是中国古代表客馆建制的组成部分,在制度方面,承前而启后,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元代;会同馆;中央客馆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3-0130-04

## 一、元代会同馆的建制

元代设有专门接待入京朝贡的四夷使节的客馆,为会同馆。

会同馆之建立,并不始于元。辽金时已有,《石湖集》载:“会同馆,燕山客馆也,辽已有之。”[1](卷37《京城总纪》)由此可知辽时燕京已有会同馆的设置。金燕京也设有会同馆,史载:“炀王弑熙宗,筑宫室于燕,逮三年而有城。城之四围凡九里三十步。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过门有两楼,曰文曰武,文之转东曰来宁馆、武之转西曰会同馆。”[2](卷33《燕京制度》)《北辕录》也载:“入宣阳门,由驰道西南入会同馆。”[1](卷37《京城总纪》)可知金燕京宣阳门内设有会同馆,作为接待使节之所。宋使入金,即居于会同馆内。《鹤林玉露》载,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范至能使金,“至能在燕京,会同馆守吏微言有羁留之议”[1](卷37《京城总纪》)。可知范至能在金燕京即居于会同馆内。西夏使节也居于会同馆内。会同馆安置西夏使节并有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详见《金史》卷38《礼志十一》“新定夏使仪注”所载。会同

馆内并设有里外门将军、监厨直长、馆都监、监酒食官、承应班祗候、众厨子、馆子、巡护军、馆伴所牵拢官等职员,负责使节接待事宜[3](卷38《礼志十一》)。

元承辽金之制,也有会同馆的建立。《续通志》卷133《职官略四·金元官制》载,元礼部下属有会同馆,内置“领会同馆事一人,以尚书充,大使二人,副使二人”。《元史》卷85《百官志一》所载更为详细:“会同馆,秩从四品。掌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罢之。二十九年复置。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为定制。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一员,正三品;大使二员,从四品;副使二员,从六品。提控案牒一员,掌书四人,蒙古必阁赤一人,典给官八人。其属有收支诸物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十九年,以四宾库改置。”<sup>①</sup>由《元史·百官志一》所载,可知会同馆机构设置情况如下: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一员,正三品;会同馆大使二员,从四品;副使二员,从六品。提控案牒一员,掌书四人,蒙古必阁赤一人,典给官八人。会同馆所属有收支诸物库,秩从九品,内设大使

收稿日期:2001-10-20

基金项目:本文为西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00NW25

作者简介:王 静(1973-),女,江苏南京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sup>①</sup>《元史》卷85《百官志一》与《元史》卷7《世祖纪》在有关会同馆始置时间上有出入,对此校勘记有:“按本书卷七《世祖纪》,会同馆初立于至元九年十月癸卯,卷八《世祖纪》至元十年九月壬寅条又见会同馆。此作‘十三’误。”则会同馆当是初立于至元九年十月癸卯,见《元史》卷85《百官志一》。

一员,副使一员。另还有会同馆收支库攒典一职,《元史·选举志》载凡库藏司吏库子等出身迁选办法,有大德四年(1300年):“会同馆收支库攒典,与长秋库同。”[4](卷83《选举志三》)另据《续文献通考》卷53《职官三》载,礼部所属有领会同馆主事二人,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增置。

前引《元史·百官志一》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罢会同馆,当指将其改为四宾库一事而言,《元史》卷15《世祖本纪十二》载,至元二十五年七月壬辰,“改会同馆为四宾库”。又据前引《元史·百官志一》所载,会同馆所属有收支诸物库,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四宾库改置。因此,综合《世祖本纪》及《百官志》所载,可知至元二十五年时罢会同馆,将之改为四宾库,至元二十九年又置会同馆,而将四宾库改为收支诸物库,隶属于会同馆。

元贞元年(1295年)后,定制会同馆由礼部尚书领。元贞元年前,会同馆则由一些文职官员兼领、同领。据史载,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九月壬寅,“敕会同馆专居降附之人覲者。以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兼会同馆事,以主朝廷咨访,及降臣奏请”[4](卷8《世祖本纪五》)。至元十八年十月壬子,“以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兼领会同馆、集贤院事”[4](卷11《世祖本纪八》)。另有阎复,世祖至元八年,“为翰林应奉,以才选充会同馆副使,兼接伴使。……十九年,升侍讲学士,明年,改集贤侍讲学士,同领会同馆事”[4](卷160《阎复传》)。程钜夫,至元二十年(1283年),“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4](卷172《程钜夫传》)。亦黑迷失,屡次奉使海外诸国。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为集贤院使,“兼会同馆事”[4](卷131《亦黑迷失传》)。由上所载,可知元贞元年前,会同馆由翰林学士承旨、集贤侍讲学士、翰林集贤直学士、集贤院使等官兼领、同领馆事。

元贞元年定制,会同馆由礼部尚书领,《元史》中所见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的有:脱烈海牙,维吾尔人,“改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至治三年(1323年)七月卒,年六十七[4](卷137《脱烈海牙传》)。康里人曷曷,“拜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后又“迁领会同馆事,尚书,监群玉内司如故”[4](卷143《曷曷传》)。维吾尔人岳柱,泰定四年(1327年)授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4](卷130《阿鲁浑萨里传附岳柱传》)。泰不华,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年),“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4](卷143《泰不华传》)。

元贞元年定制,会同馆由礼部尚书领,但在元后期,会同馆并非专由礼部尚书领。如史载,至正十一

年(1351年)九月戊申,以“平章政事定住提调会同馆事”[4](卷42《顺帝本纪五》)。至正十四年(1354年)十二月癸卯,“命哈麻提调经正监、都水监、会同馆,知经筵事,就带元降虎符”。至甲辰,又以哈麻兼大司农,提调农务[4](卷43《顺帝本纪六》)。

会同馆在元代政务中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如世祖时重臣阿合马,至元九年(1272年),以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中书左丞崔斌上奏,责阿合马,言有:“阿合马先自陈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为平章,而子若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一门悉处要津,自背前言,有亏公道。”后下旨并罢黜之[4](卷205《奸臣·阿合马传》)。可见管领会同馆处于要津之位。另如会同馆内职员会同馆大使负有出使之重任,史载,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遣礼部尚书柴椿、会同馆使哈刺脱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员外郎董端,同黎克复等持诏往谕日烜入朝受命”。日烜为安南国王。至元十六年十一月,又遣柴椿等四人与安南使持诏再谕安南国王日烜来朝[4](卷209《外夷传二》)。由会同馆大使升居要职的也有其人,如维吾尔人小云石脱忽怜之孙腊真,“由会同馆使同知通政院,有政绩,官至荣禄大夫、中书省平章政事,兼翰林学士承旨、通政院使”[4](卷134《小云石脱忽怜传》)。也可见会同馆在元政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 二、元代会同馆内的居住人员

会同馆设立初期,居住人员较为混杂,凡归附元朝的各族朝覲使节均安置于其中。如史所载,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九月壬寅,“敕会同馆专居降附之人覲者”[4](卷8《世祖本纪五》)。元时一混天下,境内征服民族众多,至元十年敕会同馆专居降附之人覲者,则此时尚未在传统的夷夏观念上,对馆中的居住人员加以区分。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丁丑,“敕非远方归附人毋入会同馆”[4](卷11《世祖本纪八》)。表明这时会同馆居住人员主要是传统意义上归附的周边四夷各族,即所谓的“远人”。元时驿站交通较为发达,为元政府与周边四夷各族的密切往来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条件。正如《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条所载:“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

元与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緬、占城、暹等,皆有着较为密切的使节往来关系,除贡使外,还有慰国

哀使、贺即位使、进表使、人谢使等等的派遣[4](卷208、209、210《外夷传一、二、三》)。高丽王子及国王也时有亲自入朝的情况[4](卷208《外夷传一·高丽》)。另如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苏木都刺等海外诸国,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皆遣使贡方物[4](卷210《外夷传三》)。又有八罗孛国,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维吾尔人亦黑迷失使海外八罗孛国,十一年与此国人来朝。十二年,再使,此国国师再献[4](卷131《亦黑迷失传》)。上述诸族、诸国使节当即为会同馆内的主要居住人员。如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安南遣使郑国瓚等人朝,十一月,即“留其使郑国瓚于会同馆”[4](卷209《外夷传二》)。

另据《元史》本纪所载,来朝的诸族使节还有: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己亥朔,有俱蓝、马八、阁婆、交趾等国[4](卷11《世祖本纪八》);至元十九年七月乙酉,阁婆贡;九月辛酉,招讨使杨庭璧招抚海外,南番皆遣使贡,有俱蓝国、苏木达国、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管领木速蛮马合马等等[4](卷12《世祖本纪九》)。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福建行省招降南兀里、别里刺、理伦、大力等四国,各遣使,至元二十二年九月,马答来朝[4](卷13《世祖本纪十》)。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没刺由、罗斛诸国贡;大德四年六月,吊吉而、蘸八等国22人来朝;大德五年三月,马来忽等海岛遣使[4](卷20《成宗本纪三》)。皇庆元年(1312年)二月,八百媳妇来献[4](卷24《仁宗本纪一》);至治二年(1322年)十月,押济思国遣使献,至治三年二月天寿节,宾丹贡[4](卷28《英宗本纪二》)。天历二年(1329年)四月,占腊国贡[4](卷33《文宗本纪二》)。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七月,朵儿只国王入朝[4](卷39《顺帝本纪二》)。这些使节也应是会同馆内的居住人员。居于会同馆中的四夷蕃客在京城参加的一项主要活动即是参加元正朝贺。如《元史》卷67《礼乐志一》元正受朝仪条记载:“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朝见日,后妃、诸王、驸马、百官以次贺献礼毕,“僧、道、耆老、外国蕃客,以次而贺”。

人居于会同馆中的各族使节,饮食供张等事由通政院下属的廩给司负责。史载,廩给司,“秩从七品。掌诸王诸蕃各省四方边远使客饮食供张等事。至元十九年置。提领、司令、司丞各一员”[4](卷88《百官志四》)。

### 三、元代会同馆的历史作用

元代会同馆的设置,为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

的组成部分,在制度方面,承前而启后,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中央客馆制度指历史上周边四夷(包括今天意义上的边疆民族与外国民族)进入内地所建王朝(包括统一的中央王朝和分裂割据时的诸王朝)的京城后,各朝政府为安置和接待他们所设立的居住场所,或说所建立的中央一级的馆待机构与馆待制度。中国古代起自西汉迄于清王朝,在先秦时已形成的“华夷之辨”及“用夏变夷”的思想基础上,各朝各代均与周边四夷展开了多方位的联系与往来,其中周边四夷向内地各王朝朝觐,即是双方往来的主要方式之一。周边四夷向内地王朝派遣的朝觐使节,在进入各王朝的京城后,各朝政府即给与来朝觐的使节居住、饮食、赐物等方面的接待与管理,各方面的接待与管理并逐步呈现出制度化的特点。中央客馆制度,从实质上讲即是各王朝对周边四夷朝觐使节接待与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对人朝四夷使节馆舍方面的接待与管理。从西汉起至于清王朝,历代王朝均设有中央客馆,作为专门馆待人京朝觐的周边四夷使节的场所与机构。如两汉之蛮夷邸,北魏之四夷馆,隋唐之鸿胪客馆、四方馆,两宋之都亭驿、都亭西驿、怀远驿、同文馆、礼宾院,元明之会同馆,清之会同四译馆、俄罗斯馆、内馆、外馆等等,均为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典型与代表[5]。

自先秦始,由儒家所提出的“华夷之辨”及“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及在这一民族观基础之上形成的四夷朝贡为主体的“华夷关系”体系在中国古代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建立元王朝的蒙古虽出身“夷狄”,但在入主中原之后,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及华夷观念的承袭均较为强烈。如《元史》卷81《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才请用儒术选士,从之。”又如《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载元世祖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华夷观念的继承,使得远夷来朝觐,仍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史载,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癸酉,诏谕安南国曰:“惟我国家,以武功定天下,文德怀远人,乃眷安南,自乃祖乃父,世修方贡,朕甚嘉之。”[4](卷22《武宗本纪一》)

“华夷之辨”及“用夏变夷”思想的继承以及四夷朝觐为主体的华夷关系体系的沿袭,也相应导致了中央客馆建制的延续。元代建有会同馆,为馆待四夷来朝使节的场所与机构。会同馆是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组成部分,承前代之制,又对明清会同

馆的建制有一定的影响。从西汉蛮夷邸开始,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诸客馆、隋唐鸿胪客馆、四方馆直至北宋诸客馆,中央客馆一直都为大鸿胪(北齐改为鸿胪寺,后代因之)所掌管。秦汉时,九卿分掌中央行政事务,这一时期作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在处理四夷事务的工作中,地位重要,与此相应,中央客馆的管理即在大鸿胪的执掌范围之内。魏晋以后,尚书逐渐向朝官转化,尚书省成为一政务机构,在处理行政事务中的地位渐为重要,而诸卿寺皆为事务机构,政令则仰承尚书省,此制经隋唐至北宋沿而不改。尚书一系的主客尚书郎、员外郎负责四夷事宜,侧重于行政令,鸿胪寺负责四夷事宜则侧重于行事务,一为政令官,一为事务官,上下相承,职分明确。这一时期中央客馆的管理仍归于鸿胪寺所属。魏晋时期与隋唐时期有所不同的是,魏晋时期,由尚书分曹治事,隋唐时,则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尚书省的组成部分,掌管全国行政,六部地位渐趋重要。至宋时,寺监体制开始逐渐衰落,北宋后期,已屡有并诸寺于尚书省各部之议,宋室南渡后,并省冗官,鸿胪寺并归于礼部[6](卷165《职官志五》)。宋代,实为六部取代诸卿寺而执掌行政事务的过渡时期。至元代,不设鸿胪寺,与此相应,在处理四夷朝贡使节事务方面,礼

部地位日渐重要,元贞元年定制,会同馆归于礼部尚书管理。此制对明清中央客馆建制影响较大。明代沿袭元制,也设有会同馆,作为接待入京朝贡的四夷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馆并由礼部所属的主客清吏司掌管[7](卷109《礼部六十七》)。清入关后也设会同馆(乾隆十三年并四译馆入会同馆,合称为会同四译馆),也由礼部下属的主客清吏司掌管[8](卷114《职官志一》)。明清会同馆之设从名称至制度,均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元代之制。

### 参考文献:

- [1] 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 [2]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 大金国志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3] 脱 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4] 宋 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 [5] 王 静. 中国古代中央客馆述论[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0, (2); 汉代蛮夷邸论考[J]. 史学月刊. 2000, (3); 北魏四夷馆论考[J]. 民族研究, 1999, (4).
- [6] 脱 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7] 申时行. 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8]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责任编辑 徐怀东]

## Textual Research on Hui-tong Guan in Yuan Dynasty

WANG Jing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Hui-tong Guan in the capital of Yuan Dynasty which was used for accomodating those nationalities coming from border land and foreign countries . These nationalities came to the capital to pay tribute to the emperors of Yuan Dynasty. Hui-tong Guan was a component part of the system of Central Accommodation for Guest in ancient China, it had positive effect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an Dynasty and those nationalities from border land and foreign countries.

**Key words:** Yuan Dynasty; Hui-tong Guan; Central Accommodation for Guest

## 西北大学 4 部教材入选教育部研究生用书

最近结束的教育部 2000—2001 年度研究生教学用书遴选工作中,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和彭树智教授分别撰写的《中国思想史》、《阿拉伯国家简史》两部著作入选,另有上年度彭树智教授的一部《二十世纪中东史》专著和耿信笃教授的专著《现代分离科学理论导引》两书,该校共有 4 部著作入选教育部研究生用书。

为加强研究生培养,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从 1998 年起,在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了研究生教学用书遴选、审定、出版和推荐工作。西北大学连续两年 4 部著作入选,使这所大学成为西部地区高校数量最多的研究生培养单位。

(高立勋 王百战)